

关于张棣《金虏图经》的几个问题

孙 建 权

在流传至今的金代史料中,张棣《金虏图经》(以下简称《金图经》)是十分珍贵的一种。对《金图经》一书的研究,也早有学者关注,相关论文主要有傅朗云《张棣〈金图经〉杂考》^①、三上次男《张棣的〈金国志〉就是金图经——〈大金国志〉与〈金志〉的关系》^②、陈学霖《范成大〈揽辔录〉传本探索》^③、刘浦江《范成大〈揽辔录〉佚文真伪辨析》^④等,对《金图经》的书名、史料价值、与《大金国志》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,已基本达成共识。不过,前人的结论还存在一些可以斟酌的地方。如,张棣的归宋时间果真是在大定二十九年吗?《族帐部曲录》作为《金图经》的一门,有无更为直接的证据?这些问题关系到传统观点的修正,所以很有必要进行探讨。

一、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与张棣归宋时间的传统观点

对于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,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认为:“著者张棣,在宋淳熙中(金世宗大定十四——二九年)归正,本书发表当在那以后。所以看上去内容大致都是淳熙中,也就是金世宗大定十四年——二十九年(1174—1189)以前的事。”^⑤三上先生语焉不详,只给出了一个大致下限(1174—1189),而刘浦江先生根据《金图经》“京府节镇防御州军”门的记载,推断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在大定二十七年(1187)以后。^⑥在其后文中,刘先生复推定《族帐部曲录》是《金图经》之一门,并且进一步推断:既然《族帐部曲录》的记事下限是大定二十九年正月,那么张棣也很可能是在淳熙末(即大

①载《北方文物》1987年第2期,第91—92页。

②载《史学史研究》1983年第1期,第69—74页。

③载《宋史论集》,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93年,第260页。

④载《辽金史论》,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402—414页。

⑤〔日〕三上次男撰、曾贻芬译:《张棣的〈金国志〉就是金图经——〈大金国志〉与〈金志〉的关系》,第69页。

⑥刘浦江:《范成大〈揽辔录〉佚文真伪辨析》,载《辽金史论》,第413—414页。

定二十九年)自金奔宋的。也就是说,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自然也是大定二十九年。

以上,三上次男和刘浦江两位先生都主要依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“《金国志》二卷,承奉郎张棣撰,淳熙中归明人,记国事颇详”^①的记载,并结合现存《金图经》的内容,对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和张棣的归宋时间作出考订。不过,这当中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问题。

首先,倘若张棣果真在大定二十九年奔宋,那么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也必止于大定二十九年。然而笔者经考察后发现,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却并非终止于大定二十九年,而是更晚。其次,刘先生从《金史·地理志》中找到的支撑自己观点之证据为《金史·地理志上》“临潢府路”条:“大定后罢路,并入大定府路。”暗指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在章宗明昌元年(1190)之前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个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。刘先生似乎忽视了《金史》校勘记对此条提出的质疑:“〔三〇〕大定后罢路 按临潢路,世宗、章宗时未罢,纪传中屡见,章宗以后不见。疑‘定’是‘安’字之误。”^②可见,关于临潢府路是否在章宗时被罢,还存有争议。而本文的论证结果将为《校勘记》的反对意见提供新的证据:金朝的临潢府路在金章宗初期的确并未被罢。

二、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在明昌三年

《金图经》“京府节镇防御州军”门是推断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的最佳材料,我们可以通过金朝地名的变化推断时间。经过仔细爬梳,笔者找到了其中七个值得注意的地名:

1. 隆州(利涉军)。原上京路济州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:“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,更今名。”^③此为金大定二十九年(1189)地名变更,《金图经》已收。
2. 吉州(刺郡)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:“宋置团练。旧名慈州,天德三年改为耿州,置文成郡军,明昌元年更名吉。”^④此为金明昌元年(1190)地名变更,《金图经》已收。
3. 卫州(河平军)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:“天会七年因宋置防御使,明昌三年升为河平军节度。”^⑤此为金明昌三年(1192)卫州地位等级变化,《金图经》已收。
4. 彰德府(散府)。《金史·章宗纪》:明昌三年十一月“戊寅,升相州为彰

①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41页。

②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志上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582页。

③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志上》,第552页。

④《金史》卷二六《地理志下》,第635页。

⑤《金史》卷二五《地理志中》,第607页。

德府”^①，《金史·地理志》“彰德府”条记载与此同。此为金明昌三年（1192）十一月地名变更，《金图经》已收。

5. 复州（刺郡）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：“辽怀远军节度，明昌四年降为刺史。”^②此为金明昌四年（1193）复州地位等级变化，《金图经》已收。

6. 沈州（昭德军）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：“本辽定理府地，辽太宗时置军曰兴辽，后为昭德军，置节度。明昌四年改为刺史。”^③注意：沈州在明昌四年（1193）由节镇降为刺郡，但《金图经》仍列入节镇中，没有反映这个变化。

7. 辰州（刺郡）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：“盖州，奉国军节度使，下。本高丽盖葛牟城，辽辰州。明昌四年，罢曷苏馆，建辰州辽海军节度使。六年，以与‘陈’同音，更取盖葛牟为名。”^④按，辰州原为刺郡^⑤，明昌四年（1193）建置辽海军节度，明昌六年（1195）更名“盖州”。《金图经》既不载辰州升为节镇，亦不载辰州更名盖州事。

从上述7个地名中，我们不难看出《金图经》“京府节镇防御州军”的记事下限定然在大定二十九年之后。不过在进一步确定之前，我们需要先解除一个迷惑。第5条表明《金图经》记载了明昌四年金朝的地方建置变化，显示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在明昌四年；而第6、7两条反映的明昌四年金朝地方建置变化，《金图经》却没有记录，显示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不在明昌四年。问题出现了：同是金朝明昌四年的地方建置变更，为何复州的变化被记录下来，而沈州和辰州的变化却不然呢？对此，笔者的回答是：《金史·地理志》“复州”条记载有误，复州被降为刺郡，并非发生在明昌四年，而是在此之前。

考《金史·世宗纪下》：“（大定二十二年九月）己丑，以同知东京留守司事裔在任专恣，失上下之分，谪授复州刺史。”这条记录表明复州在大定二十二年之际已是刺郡。再考《金史·娄室传附族子海里传》：“天眷元年，擢宿直将军。……历复州、滦州刺史，……卒，年六十二。”按海里卒年62岁，天眷元年

①《金史》卷九《章宗纪一》，第225页。按，张金吾《金文最》卷六五收有《彰德府创建文庙碑》（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937-938页），题下注“天会十二年”，意天会十二年金朝已有“彰德府”，然误也。详究碑文，乃知其主旨是纪念在赵州创建文庙碑。碑文内“赵君少卿，北方名士也，辍同知彰德之节，摄此郡政”，或是讹误之源。“同知彰德之节”应指“同知彰德军节度使”，非“彰德府同知”。故此碑题名当更正为“赵州创建文庙碑”。另，乾道五年（1169，金大定九年）楼钥出使金朝，途经“相州”而非“彰德府”，亦足可驳其误。

②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志上》，第556页。

③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志上》，第555页。

④《金史》卷二四《地理志上》，第556页。

⑤按，辰州曾为刺郡的事实，《金史·地理志》失载，但仍可考出。《金史·宋宸传》云宋宸中正隆五年（1160）进士，曾任辰州军事判官。按军事判官，乃是刺郡官职。又宋宸任职辰州军事判官之际，必在大定中，故可推知辰州在升为节镇前曾为刺郡。

(1138)已为宿直将军,不难推断,海里死时必在明昌(1190)前^①,其任职复州刺史也必在明昌前。又《金史·伯德梅和尚传》:“伯德梅和尚,……典尚旼者十馀年,积劳特迁官二阶,除复州刺史。明昌初,为西北路副招讨。”明确表示明昌以前,复州已为刺郡。

以上三例,足证复州在明昌四年以前便已经是刺郡了,是以《金史·地理志》“复州”条“明昌四年降为刺史”的记载错误,不足为凭。这样,上列第3、4两条是《金图经》中最晚的两条记事,时间皆在明昌三年,故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应在明昌三年(1192,含本年)。同时可以确定,金朝临潢府路在明昌三年仍然存在。另据笔者考证,《大金国志·京府州军》记载的是金朝明昌六年的行政建置,其中也有临潢府路,故可推知:迟至明昌六年,临潢府路依然存在。

这就引出了新的问题:既然《金图经》的记事下限在明昌三年,那么张棣理应最早在明昌三年(南宋绍熙三年)才能回到南宋。这与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讲的张棣是“淳熙中归明人”明显不符,又作何解释?

三、张棣是绍熙中归明人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张棣是“淳熙中归明人”,这是目前所见关于《金图经》作者情况的唯一记载,后人引用不疑。但上文的研究结果却与这一记载相左,是何缘故?

无独有偶。与“《金图经》记事下限在明昌三年”这一结论相矛盾的,还不单单是陈振孙的记述,早于陈氏的李心传给出的信息更加明确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(以下简称《要录》)绍兴二十三年三月末曰:“是春,金主亮徙都燕京,……又作元庙于其东,以奉英格已上。”后附李心传小注:

张棣《金人志》云:英格谥大圣皇帝,庙号仁祖。而洪皓《松漠记闻》云:英格谥孝平皇帝,庙号穆宗。二书不同。按,皓归以绍兴十三年,而棣之作《志》在淳熙三年。疑后来复有所改。然“大圣”乃阿固达谥号,棣恐误记,疑不能明也。

李心传在讨论金穆宗盈歌(英格)的谥号时,发现洪皓《松漠记闻》与张棣《金图经》^②的记载有异,于是他依据二者的成书时间,推测盈歌的谥号可能“后来复有所改”,但思虑再三,还是“疑不能明”。在同书卷二中李心传也提出过这个疑问。按“盈歌”谥号是孝平皇帝,庙号穆宗,《金史》可证。在这里,

①因为海里不可能在10岁时便任职宿直将军。

②按《金图经》在《要录》中有多种名称,如“金记”、“金志”、“图经”、“金国记”、“金国志”、“金人志”等,此处《金人志》亦即《金图经》。另据《会编》篇首所列书目中,《金虏图经》一作《金虏志》。疑《要录》中“金人志”、“金国志”之名系清四库馆臣改“虏”为“人”、“国”所致。

更值得关心的是,李心传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张棣修撰《金图经》的确切时间——淳熙三年(1176,金大定十六年)。李心传谓《金图经》作于淳熙三年,符合陈振孙所云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的记载。这又是一则有力反证。面对如此迥异的记载,真相如何?

笔者推测,不外乎存在两种可能。第一,张棣在淳熙三年归宋后写成《金图经》,后来又对《金图经》作过增补,时间截止绍熙三年(1192);第二,李心传、陈振孙的记载均有误,即“淳”字的正字为“绍”,张棣是绍熙中归明人,张棣撰写《金图经》在绍熙三年。

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,第一种可能性很小。刘浦江先生已考订出《族帐部曲录》的记事下限在大定二十九年。同属张棣作品的《正隆事迹》的记事下限亦可约略考出。《正隆事迹》收有《改葬东昏诏》和金章宗为皇太孙时之事。考诸《金史》,金朝改葬熙宗,事在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;完颜璟被立为皇太孙,事在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。此两事均发生在大定末期,则《正隆事迹》的记事下限在大定末无疑。由此,似大定末张棣仍在金朝。所以,李心传谓张棣作《金图经》在淳熙三年,似误。因为张棣在淳熙三年所写的作品,断不会提到以后的事情。若云后期增补,那么李心传怎会舍弃新本而用旧本呢?修补的版本岂非更能反映最新事实?所以笔者认为李心传的记载有误。另因《金图经》叙事下限在明昌三年,则陈振孙谓张棣是“淳熙中”归明人,恐亦讹。

相较之下,第二种推测更为合理。李、陈二人都将“绍熙”误写作“淳熙”。这个假设看似大胆,却有其可能。因为李心传就犯过类似错误。如李氏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九《金字牌》的一段文字云:“绍兴末,赵子直在枢密,乃改作黑漆红字牌。”此处便将“绍熙”误作“绍兴”了^①。有趣的是,同一事,《宋史·舆服志·符券》的记载竟然是:“淳熙末,赵汝愚在枢筦,乃作黑漆红字牌。”是《宋史》此处又将“绍熙”误作“淳熙”了。这种现象的发生,盖因南宋年号彼此之间多有重字,极易生误。如建炎与景炎,绍兴与隆兴、祥兴,绍兴与绍熙等等。李心传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虽号称精审,然百密一疏,错漏在所难免,徐规先生、李裕民先生都曾有专文订正《要录》中的讹误,其中便有不少例对于误字的校正^②。这一点,可以作为李心传记载有误的旁证。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虽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私人目录学著作,却亦难免有讹误杂陈其间,如

①徐规先生已据《宋史·宰辅表》校正为绍熙,参见李心传撰、徐规点校: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(下)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657页。

②参见徐规:《文渊阁本〈系年要录〉校正举例》,载漆侠主编:《宋史研究论文集——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2年;李裕民:《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〉订误26条(上)》,《晋阳学刊》2002年第2期,第107-109页;李裕民:《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〉订误28条(下)》,《晋阳学刊》2002年第3期,第95-96页。

陈氏把《姑孰志》的主修官误记作杨愿,而实际上应是杨倓^①。我们虽不能根据以上两例就认定李、陈二人将“绍熙”误写作“淳熙”,却也有理由怀疑二人可能犯过这种错误。

依据以上论证,笔者认为李心传、陈振孙二人对张棣和《金图经》的记述均有误,张棣是绍熙中而非淳熙中归明人,张棣归宋的时间在绍熙三年或其后不久。将“淳熙”改为“绍熙”后,各种矛盾皆随之涣然冰释。

四、《族帐部曲录》确属《金图经》之一门

在《范成大〈揽辔录〉佚文真伪辨析》一文中,刘先生主要依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的《金图经》提要,猜测《族帐部曲录》的作者是张棣。笔者赞成这一猜测,并找到了新的证据。通过对比《族帐部曲录》与张棣《正隆事迹》所载人物在海陵王时的官职,可以发现:二者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。对比表格如下^②:

人物	《族帐部曲录》官职	《正隆事迹》官职
1. 耶律劝农使	威胜统军	威胜军万户
2. 耶律母里哥	宿直将军	寝殿宿直将军
3. 张中彦 ^③	步军都统	步军都统
4. 郭安国	先锋	先锋
5. 郭瑞孙 ^④	右护军	——
6. 翟永固	相	翰林承旨
7. 苏保衡	水军都统	水军都统
8. 敬嗣晖	宣徽使,参知政事	宣徽使,参知政事
9. 梁球 ^⑤	户部尚书	户部尚书
10. 胡励 ^⑥	刑部尚书	刑部尚书
11. 蔡珪	——	翰林修撰
12. 李天吉	大兴尹	太府少监,中都副留守

①参见桂始馨:《〈直斋书录解題〉所录〈姑孰志〉主修者辨析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0年第4期,第143-144页。

②本文所引《族帐部曲录》、《正隆事迹》二书,均摘录自《会编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之许涵度刻本)。对于名字有歧异者,参考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翻印之清光绪四年(1878)木活字本加以校正。另,本表人物按《族帐部曲录》所书顺序排列。

③许刻本作“张忠彦”,《正隆事迹》作“张彦忠”,活字本作“张中彦”。《金史》有《张中彦传》,故以“张中彦”为确。

④许刻本作“郭瑞孙”,《正隆事迹》作“郭安国男端孙”,活字本作“郭安国男瑞孙”,当以“瑞孙”为是。

⑤“梁球”,《金史》中皆作“梁録”,当以“梁録”为确。

⑥“胡励”,《金史》有《胡砺传》,当以“胡砺”为确。

13. 高怀正	吏部侍郎	吏部侍郎
14. 萧廉	翰林直学士 ^①	翰林直学士
15. 郑子聃	翰林修撰、起居注	翰林修撰
16. 刘仲渊	翰林修撰、起居注	翰林修撰
17. 杨伯仁	——	翰林修撰
18. 綦戩	翰林应奉	翰林待制
19. 李希颜 ^②	翰林应奉	翰林应奉
20. 徐之方 ^③	——	御史
21. 王全	右司郎中	右司郎中

根据上表统计,笔者发现至少有 21 个人在《族帐部曲录》和《正隆事迹》中同时出现过;且 21 人之中有 14 人(表中第 1—4、7—10、13—16、19、21 条)在海陵王时担任的官职完全一致,甚至包括李希颜这样的低阶小官。如此大比例的相似,证明《族帐部曲录》与《正隆事迹》极有可能都出自张棣之手。

另外,我们之所以说《族帐部曲录》是《金图经》当中的一门,除了前贤已经论述的四库馆臣所见之《金图经》恰有“族帐部曲”之外,还有另外一个理由。《金图经》既题名“图经”,自然应该按照一定体例撰写。在张棣《金图经》以前,今日犹存的尚有宋代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(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,1084)和徐兢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(成书于宋徽宗宣和六年,1124)。二书门类中都有“人物”一门,尤其是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,记述了高丽几位大臣和接伴、馆伴人员的情况。张棣撰《金虏图经》,事在二人之后,参考前人的著述方法,应属必然。况且,《金图经》与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同属记述一国事实之书,只不过《金图经》记述金国,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记述高丽而已。所以,既然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中包含有介绍高丽人物的门类,那么《金图经》中包含有介绍金朝人物的“族帐部曲”一门,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

附言:本文在写作过程中,曾得吉林大学历史系赵永春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升教授指点,谨致谢忱!

作者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

①许刻本作“右翰林学士”,活字本作“翰林直学士”,对照《金史》,知活字本正确,今取之。

②许刻本作“李晞颜”,同书《正隆事迹》作“李希颜”,活字本亦作“李希颜”。《金史·郑子聃传》也作“李希颜”,故以“李希颜”为确。

③《正隆事迹》作“徐之万”。